

约瑟夫森和他的《司汤达传》

——为《司汤达传》中译本作

朱 雯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不少作品已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司汤达的传记。前些时候出版的《时代三色》（作者为苏联维诺格拉多夫）虽说也是一本介绍司汤达生平的作品，但是严格地说，它只是一部传记体的小说，书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而且，它并没有完整地介绍司汤达的一生，而只是描写了司汤达随拿破仑一起从莫斯科撤退之后的生活经历，当时司汤达已经二十九岁了。现在这本由美国作家马修·约瑟夫森撰写的《司汤达传》，不仅史料翔实，介绍全面，文笔生动，而且观点比较新颖，代表着二十世纪对司汤达研究的新水平。

马修·约瑟夫森（1899—1978）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传记作家、诗人和编辑。他于1899年2月15日出生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林一个银行家的家庭，年青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20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他旅居法国，在巴黎跟许多法国作家过从甚密，其中著名的有保尔·艾吕雅、安德烈·布雷东、路易·阿拉贡等，从此，他便和法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约瑟夫森主要从事编辑工作，曾先后担任《退隐》、《金雀花》、《转折》等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1929年回国之后，又出任《新共和》的编辑。

约瑟夫森于1923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胡言乱语及其它》，但他不久就发现自己的长处在于撰写历史和传记。早在大学读书时候，他就对法国文学产生强烈的兴趣，后来在巴黎侨居期间，对法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又有了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这都促使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撰写了好几部法国著名作家的传记。他的第一部传记《左拉及其时代——战斗的文学生涯》发表于1928年；他的《让·雅克·卢梭》发表于1931年；《维克多·雨果——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发表于1942年；《司汤达，或对幸福的追求》发表于1946年（三年以后，他和妻子汉纳·约瑟夫森合译的司汤达自传《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回忆》在美国出版）；《超现实主义作家传》发表于1962年。

除了文学领域之外，马修·约瑟夫森所关心的另一个主题是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这方面他写过《巧取豪夺的大亨——美国的大资本家，1861—1901》（1934）、《政客，1865—1896》（1936）；《空中帝国》（1944）、《城市的英雄奥·史密斯传》（1969）、《金融巨子：大金融资本家，1925—1950》（1972）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描述了美国工业巨子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人如何成为这个金元帝国的真正主宰的发家之路。

约瑟夫森自1968年起曾先后被聘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欧文分校的特邀讲师和圣克鲁斯分校的客座教授。讲学之余，他仍然坚持著述。1978年3月13日，马修·约瑟夫森在加州圣克鲁斯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马修·约瑟夫森是一位涉猎面广、开掘度深的作家。他为许多著名文学家、社会科学家撰写的传记作品表明了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又表明他还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他的《司汤达传》则是这两种意识兼而有之的成品。我以为，马修·约瑟夫森撰写《司汤达传》的目的恐怕并不仅仅在于想通过对陈年旧帐的详细考证来追溯一位伟大作家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更主要的是在于希望从中挖掘出一种伟大的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来惊醒和启迪二十世纪的读者。《司汤达传》发表于1946年，但它实际上却是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火中写成的。在传记的序言里，作者这样写道：“当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西方领导人的软弱无能似乎不可避免地在一个新的欧洲中世纪铺平道路的时候，重新展读这个作家的书信和日记将会找到多少的安慰呵，这个作家诙谐机智，曾经在拿破仑的宫廷里当过差，又在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一起仓皇逃窜过。”又说：时隔不久，“从1940到1944年，法国被德国军队占领的期间，在进行着一场抗击敌人的坚持不懈的秘密斗争的法国青年中间，出现一种极为感人的司汤达热，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有为的青年，象《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那样，“因为参加殊死的抵抗运动而献出了生命”。作者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的《司汤达传》所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般的中国读者或许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正是这个被我们不少人斥之为野心家和伪善者的于连，在当时竟然会成为欧洲青年崇拜的精神偶像。诚然，接受美学的原理也许可以被看作解释这一现象的一种方法，然而，具有不同精神与文化因素的接受主体毕竟还得依赖于审美客体本身的固有特性。因此，在一个更全面、更宽广的层面上来进一步考察和发现司汤达和他的作品的革命的进步的內质，显然是我国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欧洲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里，司汤达可说是最复杂的一个。他常常戴上假面具，把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充斥着暗语和密码，他使用了几十个化名，行动诡秘，被一些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怀疑为间谍或特务；他的小说也扑朔迷离，费人猜测，这一切都给撰写他的传记增加了困难。然而，约瑟夫森的创作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他已经突破了重重难关，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司汤达形象。

尽管作者对司汤达怀着崇高的敬意，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传记主人公写成一个头上带着光圈的圣者，或者毫无瑕疵的先知，恰恰相反，作者笔下的司汤达首先是、也始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青年时代，司汤达既是一个血气方刚、极有抱负的青年，同时他也沾染上了一般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都具有的虚荣心。一方面，他对拿破仑王朝里的虚浮风气深恶痛绝，可另一方面，他却又会因为没有得到这个王朝所颁发的一二枚勋章而耿耿于怀。1814年拿破仑的倒台意味着司汤达在政治上的失势，因此司汤达对波旁王朝怀有刻骨的仇恨，然而传记作者也没有忘记真实地向读者披露，司汤达曾向复辟王朝的统治者写过效忠信，尽管司汤达可能也象于连一样，仅仅是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

给司汤达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撰写传记，常常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完全对立的史料与观点，在这种时候，作者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例如，司汤达作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绘画史》，被许多人指责为是一部“剽窃之作”，指责者凿凿有据，

振振有词，一向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马修·约瑟夫森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甄别之后，十分公允地指出，尽管司汤达在作品中大段引用了兰奇神父的历史著作，然而过去对他在这方面的种种指责事实上是过于苛刻了：司汤达用来描述意大利历史与艺术关系的绪论的绝大部分和对利奥纳多的长达一百页的专题研究，以及第二卷中论述理想美的大部分篇章都是他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第一次表述了他真正个性的《意大利绘画史》包含着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几乎是太新颖太‘革命’的思想”。

如果考虑到这部传记的全名叫做《司汤达，或对幸福的追求》，我们就不应该对书中所描写的众多的爱情事件感到奇怪。因为在司汤达看来，幸福只包含着两重意义：事业和爱情；而对司汤达来说，后者更为重要。既然在文学创作中描写爱情并不视为禁忌，那么在传记创作中这种禁区同样也不应存在。毋庸讳言，低劣和庸俗的爱情描写无疑会降低全书的格调，有损于人物的形象。而马修·约瑟夫森所披露的种种“感情风暴”却丝毫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恰恰相反，作为充分展示司汤达独特心态的一种特殊媒介物和载体，它们正好和盘托出了一个真正的充满激情的司汤达。他是那样真诚，那样热烈，那样深情，却又是那样诡谲，那样善用手腕，甚至那样明显地怀着想要达到个人升迁目的的意图。当然，约瑟夫森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通过这些爱情描写给我们一种信息量上的满足和趣味上的投合，而且更在于向我们揭示出这种爱情事件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直接关联。他深刻地指出，爱情对于司汤达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放纵的情欲，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感受。司汤达的“纸上谈兵”式的恋爱显然是他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一种特殊手段，他不断地与一些女性相周旋，“而在这之后，就产生了我的作品”。

一个高明的传记作家必然会将他的传记主人公的灵魂揭示得非常深刻，将他的性格刻画得十分丰满，事实上，一个充满内心矛盾、存在许多缺点的普通人，较之一个十全十美的贤哲往往更具有魅力和活力，更能使读者受到感动。马修·约瑟夫森将司汤达的一颗活的灵魂端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超越了时空界限依然感受到它的剧烈跳动，这是他的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让读者尝鼎一脔，我想先在这里引录一段司汤达同达鲁伯爵夫人的爱情瓜葛和隐秘用心的描写，象这样生动精彩的片段，在书中是俯拾即是的：

他们常常相处在一起，虽然她说话谨慎，对他还是显得越来越温柔。他有很多“进攻”的机会，但他照例是战战兢兢，“为恋爱而恋爱”，陶醉于追求异性的过程本身，象他后来所说的，往往“走一步，停一下，观察一番，或者欣赏一会自己的处境”。譬如说把她的手套递给她，又要她把手套交给自己，让他抓着一会儿，拨弄一会儿，抚摸一会儿，好象那是她的一双手似的，然后笑咪咪地还给她；分手的时候，她伸出手来，让她亲吻——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最大的乐趣。

大家都知道，达鲁伯爵在皇帝宫廷里忙于公务的时候，司汤达是怎么样殷勤地侍候着她的。不久，他在维也纳的同僚军官们都认为他已取得达鲁伯爵夫人的公开情人的地位，而出于愚蠢和虚荣，他听了同僚们的这些谨慎的恭维话竟然大为得意。

想方设法去窃取他上司的妻子的心，这难道是件正当的事情吗？他对比埃尔·达鲁有着极大的反感，觉得他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既怕他出言尖刻，又恨他以陈词烂调，显示他那老一套的文学趣味。如果说他被那个绰号多姿、窈窕纤细、意志高强、“生来

治人”——正好迎合他色情受虐狂的癖性——的亚历山德琳所吸引的话，那么确实因为他为一种“狂热的野心”所吞噬了。他一定要征服这个伯爵夫人，得到她的助力，让自己成为朝廷里的一个官员，佩上荣誉十字勋章，至少要弄到从男爵的封号和采邑。当时他父亲的经济情况也已改善，因而在写给父亲的信上，他提到自己有升官的希望，并要他多给点一钱——每年六千法郎，从他将来要继承的全部财产中支付——以便他可以按照与他的雄心相称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曾经是个严肃的共和主义者竟然还要求父亲为他买一个贵族头衔。在去巴黎之前，亚历山德琳再一次表示允诺，她将尽一切努力为他争取一个审计员的官职。

1809年11月下旬，她离开了维也纳。登上马车的时候，她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天真地认为，这是为他而流的。她跟这个作为“亲爱的表弟”的他道别，并且当着大家的面和他亲吻。尽管她兜着一块面纱，但他觉得她是真心诚意地给他亲这个吻的。

他在奥地利又住了两个月。军需处派他去那风光绮丽、物产富饶、遍地都种着葡萄的匈牙利平原短期出差，为占领军征集粮食。可是1810年2月，他又回到了巴黎，飞速赶到亚历山德琳那里。她闪着明亮的双眸，带给他的一份礼物，那便是最高领导者已经明确同意任命他为审计员的消息。

1983年5月，我为斯蒂芬·茨威格《巴尔扎克传》的中译本写过一篇序言，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要对一位伟大的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除了认真阅读和钻研他的作品以外，恐怕还得仔细考察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时隔五年，我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看法。象司汤达这样一位伟大而又复杂的作家，要深入地研究他，更应了解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马修·约瑟夫森的《司汤达传》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甚为珍贵的资料，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传记作品。四十年代末，我曾有过翻译这本书的打算，只因我当时正忙于翻译阿·托尔斯泰的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和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曲》等小说，一时抽不出空来，而以后，又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光阴荏苒，一晃已有四十整年，现在看到包承吉、鲁效阳同志把这部传记翻译出来，我的高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尽管我已年迈体衰，而又杂务丛胜，还是为这个译本写了以上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想法。

（上接第88页）

标也是管理的手段，管理者通过规定合乎需要而又切实可行的目标，方能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人们的目标行动，以最终地实现组织目标。同样，在学校管理中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学校目标。因此，学校管理的逻辑基点是目标管理。

（4）要明确本学科的核心内容。质量是管理追求的直接现实，质量管理是现代管理的一个核心

问题。在学校管理中，质量不仅是培养人才这个最终目标所在，而且也是在达成学校目标的过程中，学校管理各项具体工作都须追求的直接目标。所以，抓住了质量管理才能在总体上抓住了学校的根本。

如果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时，能够认真地思考和把握住学科逻辑的上述几个要素，构建本学科体系的工作一定会顺利得多。